

理论动态

(第 215—232 期)

第十二辑

人民出版社

3
8
12

理论动态

(第215—232期)

第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内部读物

注意保存

人民出版社

本书所引某些尚未正式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请勿公开引用。

汇编时部分文章原作者作了个别文字改动。

理论动态

(第215—230期)

第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6开本 8.75印张 146,000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800

书号 17001·80 定价 0.73元

(内部发行)

《理论动态》汇编本发行办法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印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因印数有限，不能更多地应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的要求赠阅，由本社出汇编本。

《理论动态》汇编本分辑出版。1977年的第1—34期为第一辑，1978年起，每季汇编一辑。

《理论动态》汇编本的发行工作，由省、市、自治区新华书店内部发行部门办理，采用主动分配的办法。发行对象主要为地、市委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和地、市委以上的领导机关（包括同级的理论工作部门），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委党校教学人员。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应该肃清	1
领导群众治穷是共产党的天职	5
西藏考察侧记	10
在调整中加快发展交通运输业	26
关于制定长期计划的一些初步认识	32
认真解决组织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48
发展渔业的指导思想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67
克服畏难情绪	74
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献	77
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任务	80
权力不能过分集中于个人	92
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	97
康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	101
扩大民主必须根绝官僚制	108
发挥原工商业者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13
正确理解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关系	117
“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123
老干部的一项重大政治责任	131

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应该肃清

在党的工作重心实行转移后的一年半当中，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难发现，不论是路线的贯彻，政策的落实，还是改革的推行，仍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重重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何方？溯本求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排除四化建设的障碍，必须充分估量封建主义思想对我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党内生活的影响，并把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斗争提到应有的战略地位上来，决不能对它掉以轻心。

我们的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从党成立那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同封建专制主义的生死搏斗，直到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党也受着封建主义思想的腐蚀和侵袭。腐朽的封建传统观念，在我们党内一直是一股不可低估的顽固的精神力量。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主义遗毒，经常不断地干扰、破坏着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制订和贯彻，影响、妨碍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顺利实行。十年动乱之际，封建主义的流毒恶性发展，重新泛滥。它的反动性和破坏性充分暴露，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令人痛心的浩劫。

粉碎“四人帮”将近四年。徘徊在社会上的封建主义幽灵当然不可能随着林彪、“四人帮”的被埋葬而彻底消除。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政治、经济领域里某些改革的初步实施，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在某些方面有所触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党内，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更没有得到有效的克服。例如，迷信个人；某些领导人员中的家长制、一言堂；某些干部在政治上搞特权，在生活上搞特殊；党内顽强存在的某些宗派行帮残余；干部制度上的终身制，经济领域里的闭关自守、官工官商作风；等等。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专制主义、帝王思想、皇权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宗法思想、蒙昧主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在现代生活中的反映。它阻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作风的贯彻和发扬，阻碍、破坏各项改革的实施，搞得不好，就会把无产

阶级政党、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人民之间的关系，变成封建的君臣关系、主奴关系、行帮关系、人身依附关系。

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近六十年的革命斗争，直到今天，还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如此强大而广泛的影响？其中，既有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也有工作上的经验教训。

在我国，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封建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相当彻底地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对于具有长久历史渊源的庞大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虽然作过多次批判，却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清除掉。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及时地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对于中国特点的分析和阶级估量上，我们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全国解放前，我国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与其说，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莫宁更准确地说，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就是说，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时候，对我国的历史情况，还缺乏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强调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必要的。但是，对封建主义的社会痕迹，对封建主义思想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党内生活中的影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腐蚀和侵袭，却缺乏足够的估计和警惕。这种脱离实际的分析，造成了我们实际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没有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斗争，摆在应有的地位，缺乏长期地持久地肃清封建思想的准备。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不但划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也划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界限，致使封建主义思想能够冒充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和社会上合法存在。例如，把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和封建家长制混同起来，并把封建家长制当作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加以保护；把自力更生和闭关自守混同起来，并把闭关自守当作自力更生，加以提倡。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更是变本加厉。他们用封建法西斯专政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镇压，他们把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爱戴，同封建主义的忠君、膜拜加以混淆，大搞个人迷信，在堂堂社会主义国家，导演了规模空前的新的造神运动。

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经济落后、封建主义传统久远的国家里，工人

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尽管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对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决不可忽视。因此,作为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一定要把反对封建思想腐蚀、侵袭的斗争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长期持久地进行下去。否则,我们在这种侵蚀面前会打败仗,甚至亡党、亡国、亡头。这是需要认真记取的深刻历史教训。

我们重视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决不意味着放松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警惕。在四化建设中,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将愈益显得重要。当前,在一部分青年人当中,在某些涉外活动较多的地区,这种斗争,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我们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是要反对它唯利是图的世界观、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风,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去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用来服务于我国的四化建设。同样,我们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是要清除反动的地主阶级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影响,这丝毫不排斥我们对封建时代文化遗产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什么是我们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精神武器?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回答:在当代,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武器,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小生产思想不可能战胜封建主义。作为个体经营的小生产者,只能产生平均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它不可能摆脱封建皇权主义的影响,不可能冲破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带着小生产眼光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同志,在他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以前,往往划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界限,极其容易接受封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他们地位的升高,权力的增大,就很可能沾染上一种封建特权思想和帝王习气,以至把自己置于同无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地位。

资产阶级思想,也不可能战胜封建主义。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封建主义思想来,是进步的东西。但是,今天,当人类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它已经腐化,已经无力。我们决不能用资本主义思想去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更不能因为反对封建主义而去赞美资本主义。

肃清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应当从两方面来进行。

一方面,要进行思想教育。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的界限,以提高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自觉性。千万不要再混淆是非,良莠不分,重蹈历史覆辙。封建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敌对思想。但是,反映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

这些矛盾,应当采用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能简单粗暴,随意打棍子,戴帽子。

一方面,要实行制度改革。我们早已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取代了旧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但是,由于思想上的封建残余没有肃清,它必然反过来反映在我们的制度上。在由我们自己制订的党和国家的某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制度和规定中,必然会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在现实生活里,它保护着某些封建性的东西,并为封建主义的滋长,留下了漏洞和缝隙。

我们应当认真地查一查,我们的政治、经济、组织等各种制度,有哪些还保留着封建主义的痕迹,有哪些为封建主义的存在和滋长留下了漏洞。要下定决心,认真地而不是马马虎虎地进行一番改革。决不允许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人为地保留甚至增添封建主义赖以滋生的条件,贻害子孙后代。

要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最根本的,还要靠努力搞好四个现代化,迅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封建主义既不能产生,又不能发展的物质基础。封建主义思想是封建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极端落后的产物。当前,封建主义思想之所以还能够继续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因此,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封建思想,最根本的,也只能靠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封建思想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我们要集中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只有到了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极大提高,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的时候,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才能从我们党内,从我们的社会中彻底铲除出去。

(第215期,1980年7月5日)

领导群众治穷是共产党的天职

最近，党中央提出建设西藏的任务和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治穷。这个精神不仅适合于西藏地区，而且对于各个地区和各条战线都有启发思想的作用，它将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治穷致富而奋斗。

我们国家已经解放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我国在政治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整个说来，还是很穷的。个别省、区，特别是某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偏僻的老革命根据地，那里的农民更穷，他们辛勤劳动一年，所得却甚微。不少人家手头无钱，锅里少米，身上缺衣，连较低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定要领导群众大力治穷，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尽快地摆脱贫穷状况，逐步富裕起来。

要治穷，首先要端正对穷和富的认识。

林彪、“四人帮”把穷和富的关系搞得混乱不堪，认为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制造出“穷革命”、“富则修”的谬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们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到处“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反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等等。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我们许多干部思想上怕富，政治上批富，措施上限富，门路上堵富，分配上卡富。那个时候，群众也怕讲富，怕露富，更怕把自己当成“暴发户”。于是，在干部和群众中普遍存在一种“恐富症”，盼富不敢富，大家只好绑在一块穷，似乎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是不是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在阶级社会里，穷或富，是同占不占有生产资料相联系的。地主资本家靠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剩余劳动而发财致富；劳动者则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遭受剥削而一贫如洗。在旧社会，穷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结果，穷和富反映着一种阶级对立的关系。所以，摆脱贫穷是劳动人民祖祖辈辈的愿望。但是，在旧社会，

他们的这种愿望是实现不了的，只有起来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改变私有制，才能创造由穷变富的客观条件。所以那时说“穷则思变”，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早已成为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大家都生活在集体之中，人人平等劳动，按劳分配，已经具备了由穷变富的客观条件，这时再说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就毫无道理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送穷”，而绝不应当“颂穷”。

富了会不会变修？

富和修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富了就会变成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在于富，而在于剥削剩余价值。我们共产党只反对剥削，从来不反对富裕。富裕作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概括，并不专属哪一个阶级，而是人类共同向往的。所以，在对待富的问题上，关键要看是劳动致富，还是剥削致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群众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劳动致富，不仅不应当指责和限制，而且应当大力鼓励和支持。劳动致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更不会导致党变修、国变质。林彪、“四人帮”不区别劳动致富和剥削致富，把二者混淆起来，胡说富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贩卖他们那套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大力治穷，劳动致富，这首先是由我们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所决定的。党的纲领和任务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消灭剥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并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人类最富裕、最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三十年前，我们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也可以说就是领导人民大力治穷，由穷变富，让人民丰衣足食，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害怕富裕是一种糊涂思想。四十多年前，斯大林就批评过苏联党内这种怕农民富裕起来的糊涂思想。斯大林说：“当有资本主义分子并且有受资本家剥削的穷人的时候，列宁主义者是依靠穷人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分子已被击溃，穷人已摆脱了剥削的时候，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不是要巩固和保存已经被消灭了存在前提的贫穷现象和穷人，而是要消灭贫穷现象并把穷人提高到过富裕生活的水平。”（《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今天重温斯大林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克服那些怕群众富的“左”的思想障碍，仍然是很有教益的。

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穷致富，是天经地义。如果我们党不领导群众去治穷，去抓富，不能使群众由穷变富，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么，群众就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我们党就从根本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多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领导好群众治穷，党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大力治穷，由穷变富，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能够保证全体劳动者支配和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使大家共同富裕起来。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列宁选集》第3卷第571页）我们一些同志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真理，他们不懂得，穷是战胜不了资本主义的，穷也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那是愚蠢的。正如斯大林所说：“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 and 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使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生活，人民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如果这样，群众就不会欢迎社会主义，就不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总之，大力治穷，由穷变富，是共产党的天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把穷和社会主义联在一块，是地地道道的假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歪曲。

治穷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抓那些经济上贫穷的、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省份的长期落后的地区。

这些地区为什么长期没有根本改变贫穷面貌？尽管具体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根子是极左。当前，为了肃清极左的影响，必须从方针政策上加以调整。

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在汉族地区，也要适当扩大地方权利）。民族自治权就是民族自主权。没有民族自治

权,就不能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没有民族自治权,也就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认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尊重民族自治权利。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治穷的首要条件。

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在处理人民群众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要首先照顾群众的利益,尽力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在这类地区,在最近三、五年内,可以考虑减免征购任务,国家可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议购、换购等办法,鼓励生产队和社员将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要免除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坚持等价交换,禁止无偿平调。

要实行特殊的灵活的政策,调整经济关系,把经济搞活。在所有制方面,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允许几种经济成份和几种经营形式同时存在。除鼓励社员办好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外,还必须利用他们个体经济或个体经营的积极性,认真落实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和家庭副业政策。集体经济规模不适当的,可以在适当时候有组织地进行一些调整。生产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组。个别居住偏远的独门独户,也可以包产到户。在城市里,除发展集体所有制外,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搞个体经营,开设夫妻老婆店。工业、手工业、交通、财贸、外贸等方面,也都要放宽政策,实行灵活措施。

发挥优势,广开富路。比较贫穷的地区,大多是山区、牧区,这些地区一般都是人烟稀少,地域辽阔,资源丰富。要按照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那些适宜发展的东西。如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省、区,应当充分发挥草原的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和畜牧加工业。如果这些地区能认真地利用自己的自然条件的优势,逐步发展畜产品的粗加工,进而搞精加工,许多牧区人民的收入很快可以显著增加。

贯彻党的政策要从实际出发。贫穷落后的地区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方面,与比较富裕的地区相比,差别很大。因此,对这些地区,决不能搞一刀切。什么工作都搞一个标准,一律照办,整齐划一,统一进度,一刀切,那是根本行不通的。过去我们最大的教训,恰恰是不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论农区与牧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发展快的地区与落后的地区,什么都搞一刀切,一个样。在农业上,一律搞“以粮为纲”,不搞因地制宜,适当集中,全面发展。在作物品种上,忽视当地的特点和群众的习惯,强行推广种植某些作物。在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上,也是一个要求,一个模式,一个进度。在推广先进经验中,也一律照搬,一个地方开山造平原,也要别的地方开山造平原;一个地方造梯田,也要别的地方造梯田。如此

等等。这种不从实际出发,不承认差别的做法,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它使我们在实践中到处碰壁,使工作遭受巨大损失,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困难。这是这些地区长期没有摆脱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在领导群众治穷的斗争中,一定要改进工作方法,特别要解决好共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任何事物或矛盾都有其特殊性、个性,而普遍性、共性即寓于特殊性、个性之中。列宁早就说过,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也总是告诉我们,认识一个事物,要首先认识它的特殊性、特点,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一刀切的工作方法,只看到了统一、共性,忘掉了特殊性、个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

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呼声:“这个问题,中央没有指示呀!”“没有正式文件不好办呀!”等等。我们搞四化,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明确的,问题是你那个地方怎样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加以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只能从全国的普遍情况出发,各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必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如果有了中央的东西,自己不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特点,提出实施的具体办法,而是生搬硬套,执行“不走样”,我们还会吃主观性和片面性的苦头。因此,任何一个领导机关,任何一个领导者,首要的任务是了解和掌握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情况,从实际出发,把共性和特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现在,我们国家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是很穷的。我们全党,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治穷的任务,实现四化就是治穷的根本办法。我们党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好事,当前最紧迫的就是要领导群众千方百计治穷,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在物质上和文化上尽快地提高起来。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如果一个领导者在很长时期内还不能改变自己所领导的那个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就是最大的失职。今后,衡量一个领导者工作的优劣,主要应当看他所领导的地区是否生产年年有所发展,人民是否逐步富裕。只要我们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大干四化,治穷就会较快地收到显著成效。

(第216期,1980年7月10日)

西藏考察侧记

党中央非常关怀西藏的建设。鉴于西藏的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央决定对这个地区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以休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国民经济，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目前，中央的政策已经付诸实施，受到西藏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今年五月下旬，胡耀邦、万里同志，受中央委托亲自到西藏考察，同当地干部共商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生活的大计。这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恢复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

我们有机会随两位领导同志一起到西藏进行学习、调查。除了在拉萨列席了一些重要汇报会和座谈会外，还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走了日喀则地区五、六个县，亲眼看了看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社会情况。许多同志关心西藏的实际情况，我就把此行的所见所闻作一些介绍。同时，也想通过介绍情况，尽可能表达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心声。

(一)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我们离开首都机场飞往成都，准备从那里直飞拉萨。就这样开始了难忘的西藏之行。起飞不久，耀邦同志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前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谈了去西藏考察的目的。他说，中央让我和万里同志，还有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去西藏考察，不是去参观，而是去工作，要去解决点问题，主要是同那里的藏族、汉族干部共同商量如何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计。这就是我们此行的主题。你们要作报道，这也就是标题了。

耀邦同志说，关于西藏的工作，中央已经发了一个“31号”文件，我们这次去也

就是要实际看一看，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发文件和考察，都是为了发展西藏的经济，使西藏人民生活尽快得到改善。耀邦同志说，西藏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们现在还很穷，生活还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团结的新西藏。

耀邦同志对记者们说，要治“穷”，首先是两条：第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第二就是要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团结还能有什么发展！他特别指出，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在西藏，与在别的民族地区不同，与内蒙、新疆以及青海等省区都不同。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藏族。所以，团结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我们进藏的汉族同志（包括军队和家属）同广大藏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某些汉族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

接着，耀邦同志还讲了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也可以说是几项大政策。讲到为什么要采取这些大政策的理由，他说，西藏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它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第二，人口不到二百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二十九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是给了西藏很大帮助的，总投资达四十五个亿。可是国家从西藏人民中征的税收、公粮总值不过五千九百万。二十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因此，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考虑一个根本的方针，就是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耀邦同志简明扼要地把中央考虑的几项非常措施概括为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时间至少两年。不但免农牧业税，还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征用劳动力。放开，就是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生产队更要有充分的自主权，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生产队一般不要过大，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都可以因地制宜。总之，怎样对生产发展有利就怎样发展。走人，就是要逐步地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下少数工作上确实最必要的，并

且要求他们服从组织分配，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加强同西藏人民的团结。

耀邦同志在途中的这些谈话内容，抵达拉萨后，他和万里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同当地的领导同志讲，并且根据考察的情况，他们又作了许多具体的补充。最后形成了五月二十九日耀邦同志在拉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这六件大事就是：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二、大大减轻群众负担，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三、在所有经济政策方面，都要放宽，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促进发展藏族人民迫切需要的用品上；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两三年内，要使西藏的国家脱产干部中藏族干部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耀邦同志说，办好这六件事，认真实行这六条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两年到三年内，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两三年、五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的最好水平，十年就要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耀邦同志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提出的六条，集中反映了党中央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对西藏工作的主要方针和政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所起的动员和鼓舞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各方面人士的反映都非常强烈。

(二)

二十一日晚，我们在成都过夜。这天下午，部分同志利用旅途空隙，参观了著名的杜甫草堂和诸葛武侯祠。大夫们还为所有的同志检查了心脏、血压，作好了明日直飞拉萨的最后准备。

二十二日上午，天候一直非常好，晴空万里。一望无际的群山，蜿蜒曲折的公路、河川，历历在目。八点四十从成都起飞，三小时后，飞机按预定时间平稳地降落在雅鲁藏布江畔的贡噶机场。飞机还在低空盘旋，凭借着高原上特有的清晰的能见度，我们就已看到自治区的同志们在停机坪等着迎接来自北京的亲人了。可以设想，同志们的心情和我们的心情一样，都非常激动。飞机停稳后，耀邦同志、万里同志高兴地走下舷梯和前来迎候的自治区的同志们热烈地一一握手问好。几位藏族同志向领导同志们献上洁白的哈达。没有特别的礼仪。这种同志式的战友之间的会见，是格外亲切感人的。

从踏上西藏自治区土地的第一分钟起，我们就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从